

# 想象的空间？

1901—1947 年及以后天津意大利租界的重现和镜像

[意] 马利楚

这不是非洲！这是一个典型的（par excellence）的商业国家，一个可以让我们国家专门从事纺织和印染业的企业家获得大量金钱的国家。

—中尉军医朱塞佩·梅塞罗蒂·本温努迪（Giuseppe Messerotti Benvenuti）<sup>1</sup>

与中国的友谊根植于意大利的传统和历史。我们的人民、光荣传统和千年文化的继承人，分享着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共同语言，创造了代代传承的亲密关系。今天，这种古老的联系正在被充满活力的经贸往来、科技协作、文化交流以及不断增长的游客潮所促进（……）正确地评价历史和回顾我们自己的根基是成功地面对未来的关键。

—2006 年 1 月 18 日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卡洛·阿泽利奥·钱皮（Carlo Azeglio Ciampi）为“中国意大利年”开幕发表的贺词。<sup>2</sup>

今天，欧洲和美国的资本和劳动力，并且对于大部分意大利劳工来说，已经成功地在中国修建了大约 3500 英里的铁路，然而，与中国的全部面积相比，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因此，它是巨大的等待可向人类活动开放的经济开发的处女地，并且克服困难的努力可被证明是正当的（……）所有由于商业和工业发展而自觉十分强大的国家，都对这个巨大而又未开发的中国市场兴趣昂然，都要抓住每一个有利的机会来推倒保护这一宝藏的围墙，力避在开发这个巨大的新市场中落后或者遭到排挤。

—意大利租界领事文森佐·菲莱蒂：《天津意大利租界》，热那亚：巴拉比欧和格莱夫，1921 年（Vincenzo Fileti, *La Concessione Italiana di Tientsin*, Genova: Barabino e Graeve, 1921），第 8—9 页。

## 前言

---

1 尼古拉·拉夫兰卡编辑《朱塞佩·梅塞罗蒂·本温努迪著〈意大利与中国的义和团：书信集（1900—1901）〉》，摩德纳：G.帕尼尼协会，2000 年（Nicola Lablanca (ed.), Giuseppe Messerotti Benvenuti, *Un Italiano nella Cina dei Boxer: Lettere (1900-1901)*, Modena: Associazione G. Panini, 2000），第 24 页。

<sup>2</sup> 中国“意大利年”的庆祝包括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香港、沈阳、哈尔滨、宁波和苏州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6-01/20/content\\_4075081.htm](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6-01/20/content_4075081.htm);  
[www.yidalinian.org](http://www.yidalinian.org) 2006 年 6 月 6 日。

北宋时代（960—1127），先是在宋英宗，后来又在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宋神宗的支持下，历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编写了《资治通鉴》<sup>3</sup>，目的在于提供一部上起战国时代（453—221B.C）下至宋初的通史。这一不朽作品（monumental opus）的标题暗含着把历史视为事实之镜的隐喻，揭示了历史能为治国提供参考和指导的重要作用。这种观点自宋代以来一直在中国的历史编纂中居于主导地位，据此，编史是正确管理公众事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能为管理者提供一些先人的明智行为作为正面的榜样，同时也能揭露其他人的缺点和错误。

为了去除把历史看作是“毫无疑问的、超越文本和话语的事实”<sup>4</sup>这样的观点，本文从反思镜子的假设和扩大作为事实的反映的历史著述功能开始论述。就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那样：

“在镜子中，我看到我自己在一个我自己并不在的地方，一个在镜面之后展开的虚幻和虚拟的空间；我就在那里，一个我并不在的地方，一种给了我对我自己的可见性的幻影，这能让我看到我自己在一个我不在地方：这就是镜子的乌托邦。”<sup>5</sup>

---

3 金小斌（音译）：《管理之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表达的政治和管理思想》，载托马斯·H. C. 李主编《新的和多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Ji Xiaobin “Mirror for Government: Ssu-ma Kuang's Thought o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Tzu-chih t'ung-chien*,” In Thomas H.C. Lee, ed. *The New and the Multipl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第1—33页。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文参看：<http://www.guoxue.com/shibu/zztj/zztjml.htm> accessed on 20/06/2007。

4 凯瑟琳·贝尔西：《制造历史——从理查德二世到亨利五世的莎士比亚》，载 F. 巴克、P. 休莫和 M. 伊韦尔森主编《历史的用途——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艺复兴》，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1年（Catherine Belsey, *Making Histories Now and Then. Shakespeare from Richard II to Henry V*, in F. Barker, P. Hulme, and M. Iversen (eds.) *Uses of History: Marxism, Postmodernism and the Renaissa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1），第26页。为了避免线性和进化的历史描述倾向，也可参看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质疑近代中国的叙述》，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Chicago U.P., 1997）。

5 M. 福柯：《另类空间》（M. Foucault, *Des espaces autres*），第47或755页。



图 1, 《曲面镜中的自画像》, 帕尔米贾尼诺 (Parmigianino)<sup>6</sup>

因此, 在与镜子的反影和错觉相结合的机制中存在着一个附加的因素: 失真。“曲面镜中的自画像”(1524)是帕尔米贾尼诺(1503—1550)的一幅著名绘画作品的标题, 该作品被认为是感觉失真的范例。这幅肖像画与本文开篇所引用的三段话一起, 组成了一个对于意大利在 20 世纪上半叶通过其殖民代表从中国制造的影像的恰当比喻, 这个影像为失真留下了巨大空间, 至今仍然影响着面对与中国的关系的意大利杰纳斯(Janus, 古罗马门神, 被描绘为有着面向相反方向的两个面孔)为了符合这次关于中国的外来殖民主义研讨会的主题, 本文将主要讨论意大利在中国的唯一一处租界(1901—1947)的问题<sup>7</sup>, 该租界位于现代大都市天津的河北区, 它也构成了意大利在亚洲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唯一事例。与此同时, 我将对中国港口城市天津的复杂性和相互联系的原动力保持清醒的认识; 在 1860 和 1945 年间, 该城市是一个有着多达 9 处由外国人控制的租界的场所, 一度还出现过一个多国军事政府(1901—1902), 以及一系列逐渐形成的市政管理机构。在天津, 不同的、有时还相互竞争的殖民主义肩并肩地共同行动, 除此之外, 还有一系列由中国人设立的城市管理机构。

作为一个中国和殖民地研究的意大利历史学家, 我尤其对比较和对照潜存于特别是由意大利和中国观察家、外交官和学者制造的对前意大利租界<sup>8</sup>的不同重现

6 《曲面镜中的自画像》为 16 世纪帕尔米贾尼诺所画, 目的在于揭示失真。参看: 帕尔米贾尼诺: 《自画像, 1524 年》,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Parmigianino. *Self-Portrait*. 1524.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艺术在线” 上有免费图像 <http://www.artonline.it/opera.asp?IDOpera=402> 作者资料获取时间 2006 年 5 月 20 日。

7 租界这个短语经常表示由清政府 (1644—1911) 在 1860 年以后割让给殖民势力的一块区域。

8 以后本文再提到前意大利租界均作意大利租界。

<sup>9</sup>之中的理论基础非常感兴趣，同时也兼顾在欧洲和美国出现的其它影像。这种关注意味着研究塑造了殖民地知识生产的不同方式和从后殖民主义中派生出来的话语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偶然性的必要性。

通过对以不同语言文字和在不同历史时期写作的一手和二手文本进行比较分析，本文将着重探讨在不同重现中隐匿于有关意大利租界问题之中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或文化方面的历史原因。此次讨论将特别关注两个以持久不变的特性从意大利文资料产生的主题：（一）租界的历史，它的获得以及最后它作为“现代性实验室”的社会空间的重组<sup>10</sup>；（二）把意大利租界塑造成一个意大利风格的街区或地区，一个微型的迪斯尼乐园类型的“意大利化”或者“意大利精神”（例如依照‘Italianità’的修辞）的集合地点，尤其是根据空间重现和文化附加物进行塑造的意图。

## 方法论和研究对象

我以一种对话的方式使用经过筛选的书面材料，目的在于揭示对意大利租界的重现，阐明我相信是一种蓄意提供信息和加以描述的选择性的原因，显示各党派经常属于预定性质的暗示。我将用辩证证明，在意大利文资料中居支配地位的极端肯定的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是深受在社会上传播和建构的话语行为影响的，是由各种各样社会政治和经济利益促成的，也经常为精明的、简单地通过效仿已得以确认的殖民实践原则来证明的投机行为所促进。这一点可以从意大利驻华公使嘎里纳（Count Giovanni Gallina）为立即征用他所提到的“肮脏的中国农村”行为所作的论证中清楚地看到，嘎里纳说“所有其他的殖民国家一旦占领了租界范围内的空地都立即加以征用。”<sup>11</sup>

有三个术语在本文中将会被经常用到：重现、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出于此项工作的目的，我提到了在意识形态上得以推动回应着一种目的论机制<sup>12</sup>的重现思想。与历史学重现的目的论机制相联系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建立一种统治的权力关系：目的论方法对于那些被抹掉历史的人们来说是简化的、排外的和有害的；第二，这种重现建立在作为一种线性的进步概念的时间观上，它排除了对空间的任何客观分析。从我搜集的资料来看，被等同于意大利租界地区的历时性的结构

---

9 重现的意思就是第二种或新形式的表达，这是来自艺术上的表达用语。参见乔治·迪迪-惠泊曼：《面对图像：质疑某一类艺术史的终结》，帕克大学：宾州州立大学出版社，2005年（Georges Didi-Huberman, *Confronting Images: Questioning the Ends of a Certain History of Art*,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Press, 2005）。迪迪-惠泊曼认为艺术史学家应该重视弗洛伊德的“梦想”概念，把重现看作经常卷入置换和矛盾的运动过程。

10 我从斯特勒（Stoler）那里借来了这个表达，参见安·斯特勒：《种族与欲望教育——福柯的〈性史〉和殖民的行为命令》，达勒姆，n.c.：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Ann Stoler, *Race and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P. 1995），第13—26页。

11 外交部，商务总局：《意大利天津租界》备忘录（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Direzione Generale degli Affari Commerciali. Concessione italiana di Tien Tsin, Pro Memoria, in ASMAE, Serie P, pos. 86/37, pac. 429 (1912-1914)）。

12 根据利奥塔德（Lyotard）1979年书，目的论和“宏大叙事”均被后现代主义抛弃了。让-弗兰西斯·利奥塔德：《后现代状态——一个关于知识的报告》，米尼亚波尼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年，1997年重印（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reprint 1997）。

变迁构成了一个主要题目。但是分析经常是片面的，往往导致对被输入的现代性观念的颂扬。我力图批判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的重现模式，该模式的表现是，为了证明占有当地空间、取消其认同性和附加殖民地地认同性等行为的合法性，从方法上贬低空间思维。

福柯把空间概念化为一个权力和示意策略共同作用的社会过程：

“空间被认为是呆板的、固定的、机械的和稳定的。时间则相反，被认为是丰富的、创造的、活的和辩证的（……）空间这个词的使用有着反历史的意味。一个人如果使用空间概念进行讨论，就意味着他是敌视时间的，就意味着——恰如傻瓜所说的那样——他“否认历史”（……）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些东西（空间术语）（……）意味着投入权力进程——历史的进程，无需说——的解放。”<sup>13</sup>

在作于1967年题为《另类空间》的演讲中，福柯把他所处的时代定义为“首先是空间的时代”，在这里，关键的因素是并列，这一点用空间术语来说就是：远近、并行以及最终分散的投影维度。他强调瞬间的重要性，而这一瞬间不是被想像为抽象和静态的因素，而是被想像为动态和相互关联的实体（entity）。因此他用“一张用自己的丝线联络各个孤立的点和交叉的点的网络”<sup>14</sup>的影像来描述我们的世界经历。福柯没有降低时间的价值，但是他指引历史学家把注意力转向了经常被忽视的时间与空间的交叉上，这从把空间概念化为一个权力和示意策略的共同作用的社会过程时就开始了。

约翰·赫西（John Hersey）关于殖民地天津多层次累积的认同性的重现就提供了一个远近空间肩并肩并列的例子。

“我生长在一个多么奇怪的城市呀！用3个或4个铜板，我就能坐着黄包车从我在英格兰的家到意大利、德国、日本或者比利时。我步行到法国上小提琴课，我还经常过河去俄国，因为俄国人有一个美丽的树木繁茂的公园，公园里面还有一个湖。”<sup>15</sup>

在意大利的例子中，由殖民叙事和殖民活动制造的重现已经勾勒了一幅圣徒传记式的意大利“文明化使命”的图画。这是基于1890年代的声明的：“意大

---

13 米歇尔·福柯：《权力/知识：1972-1977年访谈和其他文稿选编》，科林·戈登编辑，纽约：万神殿书，1980年（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Colin Gordon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第149页。

14 米歇尔·福柯：《说与写，1984年；另类空间（1967年3月14日建筑研究者会议）》，载《结构、运动、连续性》第5期，1984年10月（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984, Des espaces autres* (Conférence au Cercle d'études architecturales, 14 mars 1967), in *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 n°5, Octobre 1984），第46-49页。直到1984年春天福柯才同意将这篇1967年写于突尼斯的演讲发表。

15 约翰·理查德·赫西（John Richard Hersey）：《一位现场报道员一回家》（I. 在新中国路上的房子），纽约人，1982年5月10日（John Richard Hersey, *A Reporter at Large: Homecoming. I: The House on New China Road*, *New Yorker*, 10 May 1982, 54）赫西（1914—1993），美国作家和记者，生于天津，其父母为传教士。十岁时随父母返回美国。1939年，他作为《时代》周刊的记者重返中国。

利的文明化使命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殖民主义”，因此它比其它的文明化使命少一些为害，它“致力于为当地居民提供一片更好的国土，谋取更大的繁荣”。<sup>16</sup>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后殖民主义的多元化观点已经战胜了殖民地精英的观点，与历史学的解释研究一体化了的话语分析已经质疑了先前实证主义者的阅读习惯，但是与天津意大利租界相关的文献直到现在仍没有产生出反映这一新评论方法的东西。

第三个概念是“想象的共同体”观念，这里应用的均是意大利人的经历，无论是用殖民者地位术语<sup>17</sup>，还是用殖民话语行为术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对民族概念的分析中，强调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由印刷文化创造的虚构的想象的特征，他还认为在其相应的政治实体—民族国家—形成以前，人们肯定先想象出了这样的实体：“它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既深切又平等的同志式的友谊，尽管在各个国家中都盛行着实际上的不平等和剥削。”<sup>18</sup>

想象一个像现代民族那样的实体是编造围绕着我们自身的故事的一个途径，它采用了宏大叙事的形式，以至于我们都被定义为特别的民族故事里面的角色。我把类似的解释范式扩大到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上，这个租界具有一种混合共同体的特征，外国人和中国人生活在同一个被法定为意大利的永久占有地的小区内，同时它也是一个依据不同的理解 and 自我理解方案（Schemes）被“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因此，它有时会被描述为一个新拓居地（settlement），有时会被看作是殖民空间（colonial space），有时还会被当作连接两个世界的像个村子一样的区域。在个人叙事的层面上，例如总领事文森佐·菲莱蒂（在其 1921 年的文章<sup>19</sup>中）对意大利租界故事的重构，就揭示了意大利国家在殖民时代通过其殖民代表所创造的显性故事是如何帮助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的；在这里，殖民国家的代表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对于全民族而言都是成功的故事的化身。

### 意大利租界的历史起源

---

16 杰奎琳·安达尔（Jacqueline Andall）和德里克·邓肯（Derek Duncan）：《意大利殖民主义的记忆和遗产》，载杰奎琳·安达尔和德里克·邓肯（主编）：《意大利殖民主义：遗产和记忆》，牛津：彼得·朗，2005 年（Jacqueline Andall/Derek Duncan, *Memories and legacies of Italian Colonialism*, in: Jacqueline Andall/Derek Duncan (eds.), *Italian Colonialism. Legacy and Memory*, Oxford: Peter Lang, 2005），第 11 页。也参见鲁思·本-吉亚特和米阿·福勒（Ruth Ben-Ghiat/Mia Fuller）主编《意大利殖民主义》，伦敦：帕尔格拉夫·麦克米伦，2005 年（Ruth Ben-Ghiat/Mia Fuller (Eds.), *Italian Colonial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7 殖民者地位在这里是指由殖民者产生的既定认识，也可以被看作是形态或者认识及权力。

1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伦敦：左也书，1991 年（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Books, 1991），第 7 页。也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19 文森佐·菲莱蒂：《天津意大利租界》，热那亚：巴拉比欧和格莱夫，1921 年，第 8—9 页。菲莱蒂的报告中的照片非常重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意大利租界的早期发展。

镇压义和团运动<sup>20</sup>之后，在 1901 年 9 月 7 日签订的“解决 1900 年动乱的最后协议”（辛丑条约）中，意大利获得了占总赔偿额（26617005 海关两白银<sup>21</sup>，或者说 99713769 金里拉；一海关两相当于中国国家货币 1.55 两）的 5.91%。另外，还获得了在北京公使馆区的治外法权，以及对天津海河北岸的一小块区域的永久占有权。这个区域位于北纬 38° 56'，东经 117° 58'，其后发展成为意大利租界。更确切的说，意大利租界位于奥匈帝国租界和俄国租界之间，海河左岸，北京至奉天（今沈阳）铁路线和中国行政区之间。

在中国和西方的书面材料中都存在着这样一种一致意见，即这个天津租界是中国政府在 1901 年 9 月 7 日割让给了意大利的，大约一年以后，也就是在 1902 年 6 月 7 日，才被意大利占领，由作为意大利政府代表的意大利总领事进行管理。但是事实上，为了向皇家海军的登陆人员——他们属于占领天津的国际远征军的一部分——提供补给，意大利军队早在 1901 年 1 月 21 日就对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地方进行了军事占领。对于由意大利外交大臣皮里内提（Prinetti）“授权”临时占领的这个地区，则是驻北京皇家大臣萨尔瓦葛公使（Giuseppe Salvago Raggi）建议的，这与对命令的立即执行完全一致，用萨尔瓦葛的话来说就是：“与俄国占领地接壤的火车站附近地区”<sup>22</sup>被占领了。因此，经常被引用的 1902 年 6 月 7 日应当被归属于使实际占领（*fait accompli*）生效的公约。

并没有任何关于移交时期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人口数量意见一致的报告。按照 1902 年的人口统计有 13704 人，依据菲莱蒂的报告<sup>23</sup>有差不多 17000 人，而依据阿纳尔多·西西蒂—苏里阿尼（Arnaldo Cicchiti-Suriani）的报告<sup>24</sup>则是 16500 人。按照中国以 1922 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的材料，居住在当时租界的中国人 4025 名，意大利人 62 名，其它国籍的人 42 名。<sup>25</sup>依据格纳罗·E. 皮斯托雷泽（Gennaro E. Pistolese）的说法，在 1935 年共有 6261 人，其中有 5725 名中国人和 536 名外国人（包括 392 名意大利人）。<sup>26</sup> F. C. 琼斯（F. C.

---

20 义和团运动直接反对外来势力在贸易、政治、宗教和科技领域的影响。起义被镇压于 1900 年 8 月 4 日，当时有 20,000 名外国士兵攻入北京。参见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纽约：W. W. 诺顿和公司，2001 年（Jonathan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第 232 页。

21 外国索要的赔偿总额为 4.5 亿两白银，于 1901 年 5 月 12 日由皇帝颁布法令确认。在最终协议中，我们发现了银两和其它货币的换算标准，例如一两白银等于 3.75 法郎和 0.30 英镑。参见 DD, II, n. 121, 第 64 页（DD=外交文献，在意大利即《提交议会和皮里内提政府关于中国事件的外交文献》两卷本，罗马 1901 年，1902 年（Diplomatic Documents, in Italian: Documenti Diplomatici sugli avvenimenti di Cina presentati al Parlamento dal Ministro Prinetti, 2. vols, Roma 1901, 1902））。

22 引自阿纳尔多·西西蒂—苏里阿尼：《意大利在天津的租界》，载《意大利政治和文化回顾》，第 31 期，1951 年 10 月（Arnaldo Cicchiti-Suriani, *La Concessione Italiana di Tient Tsin (1901-1951)*, In *Rassegna Italiana di Politica e Cultura*, n. 31, October 1951），第 563 页。

23 菲莱蒂：《意大利租界》，第 15 页。

24 西西蒂—苏里阿尼：《意大利在天津的租界》，第 562 页。

25 南开大学政治学会：《天津租界及特区》，市政府丛书系列，天津：商务印书馆，1926 年，第 6—7 页。

26 格纳罗·E. 皮斯托雷泽：《意大利天津租界》，载《意大利回顾》，A. 13, 特刊（XLI），《意大利远东媒介》，1935 年 8—9 月（Gennaro E. Pistolese, *La Concessione Italiana di Tient Tsin*, In *Rassegna Italiana*, A. XIII, Special Volume (XLI) L'Italia e L'Oriente Medio ed Estremo, August-Sept. 1935），第 306 页。

Jones)——他对意大利租界只作了只言片语的描述——认为：“1937年那里有373名外国人和约65000名中国人。”<sup>27</sup>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推断出下列两个结论：一是意大利租界人口的锐减，从16000—17000人（1902）到4000—6000人（1922—1933）；二是中国人在数量上占显著优势。然而，意大利方面的材料趋向于淡化租界中国居民的存在，并把他们归入次要地位。这些材料同时提供了一个歌颂和自恋影像的逐步神化过程，它集中表现在美化该地区成功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其成为所谓的意大利国家成就的缩影的重现上。

特别是皮斯托雷泽在1935年写道，据最近的估计，天津的意大利人共同体只有大约150人，而不是392人。然而，他在文章中所关注的并非数据的精确性，而是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即强调“我们的租界与天津的其它租界相比有一种人口统计学上的优越性”的事实。他报道了日本租界的人口（5000人）、英国租界的人口（2000人）和法国租界的人口（1450人）。这是他和30年代其他人所使用的众多要素中的一个，符合法西斯政权试图建立“良性殖民主义”的叙事要求，强调意大利精神上的显著胜利以及在这个远离祖国的拓展地的文明化使命。

28

到1943年，在这块租界上仍有大约600人的意大利军队驻扎，但是在墨索里尼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实际上共和是虚假的）把租界转让给由日本扶植的汪伪国民政府（这个政府既没有得到意大利王国的承认，也没有得到中华民国的承认）之后，它就在1943年9月10日被日本占领了。1947年2月10日，战后的意大利正式把租界归还给了中国。

## 租界的附加收益

《辛丑条约》对意大利国家威望的获得和国际地位得到承认方面具有决定性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在回顾和与其他的在中国领土上已经获得牢固的势力和影响的外国列强相比时。对意大利获利的象征性资本进行分析会发现一些比适度的领土征服更可观的东西。首先，根据协议，意大利在获得北京公使馆区治外法权方面正式地加入到了其他殖民国家的行列。更重要的是，意大利在那个夏天获得了在上海和厦门<sup>29</sup>使用国际区的权力，也获得了在北京公使馆区和山海关驻扎军队的权力，而唯一的条件是每年仅需支付2000里拉。条约的军事后果对意大利同样非常重要，这可从三个要素方面来看：首先，意大利在北河口湾大沽锚地的财产以及相关的保卫和防御行动得到了承认；其次是为意大利获准建造和维护的卫戍部队营房选取的名字的符号学意义，在杭州称作“意大利”（Italy），在天津称作“萨伏伊”（Savoia），在北京意大利公使馆称作“皇家卫队”（Regia Guardia）；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意大利有权在必要时使用军队护卫教会、使团、铁路和矿产。

---

27 F. C. 琼斯：《上海和天津》，伦敦：汉弗莱·米尔福德为牛津大学出版社，1940年（F. C. Jones, *Shanghai and Tientsin*,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f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第128页。

28 皮斯托雷泽：《意大利天津租界》，第305—310页。

29 在二十世纪，现代的厦门也被称为 Amoy。

对于天津，协议规定：“意大利政府将像其他外国列强为其所获得的租界确立的管理方式一样，对租界行使完全管辖权”<sup>30</sup>，这达到了意大利在中国长期追求的、获得与其他殖民国家“同等”待遇的目标。<sup>31</sup>

这个协议由中国海关总长唐绍仪与嘎里纳（Giovanni Gallina）伯爵（萨尔瓦葛的继任者）签署：它明确宣称租界的割让是“为了在华北，特别是在直隶省促进同意大利的贸易。”<sup>32</sup>

以先前不断失败的经历——这从 1866 年的双边条约开始构成了意大利与中国外交关系的主要特征——为背景来考虑这个租界，可以看出租界的获得对于意大利来说具有历史复仇的意义。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首相把意大利在 1899 年试图获得中国政府对其占领 Sanmun 海湾作为海军基地并划浙江省为其势力范围要求的承认的失败定义为“几百万里拉的浪费和民族的耻辱”<sup>33</sup>。乔利蒂严厉批评了这个从头到尾的错误，强烈建议外交大臣不要公开相关文件。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意大利 1899 年的要求和继之而来的最后通牒的行为，对新建立的意大利民族的想象共同体造成了严重伤害，尤其是拒绝行为发生在所有其他外国列强（大不列颠、法国、德国，还有日本和俄国）都在中国领土内为其政治存在和经济渗透而占有战略要地作为租界和新拓殖区（Settlements）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这种伤害由于意大利 1899 年的要求和最后通牒没有得到大不列颠的支持<sup>34</sup>而得到进一步加深；大不列颠的不支持表明其他列强不希望看到意大利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影响。

1951 年，西西蒂—苏里阿尼在为纪念租界获得 50 周年而写的著作中指出：“在 Sanmun 的不幸序幕之后，事态的发展预示了 1900 年国际事件的结局。”<sup>35</sup>

意大利在中国商业利益的拥护者的鼓吹声在 1890—1900 年间尤其强烈，这不仅表现在学术层面，例如罗马大学的卢多维奇欧·诺琴蒂尼（Ludovico Nocentini）教授就写作了多篇文章支持出自《新诗集》（Nuova Antologia）、《意大利杂志》（Rivista d' Italia）和《意大利地理杂志》（Rivista Geografica Italiana）杂志<sup>36</sup>的请愿书，还表现在新闻报道层面，如约翰·维格

---

30 协议的意大利版本由作者翻译，斜体字是附加的。

31 关于意大利和中国在 19 世纪的关系可以参看乔治奥·勃卡：《19 世纪的意大利与中国》，米兰：社区教育，1961 年（Giorgio Bocca, *Italia e Cina nel Secolo XIX*. Milano: Ed. Comunità, 1961）。

32 出自协议的意大利版本。

33 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回忆录》，第 1 卷（Giovanni Giolitti, *Memorie*, vol. I），第 154 页。乔利蒂在 1904—1914 年间担任意大利首相，这一时期属于所谓的议会专政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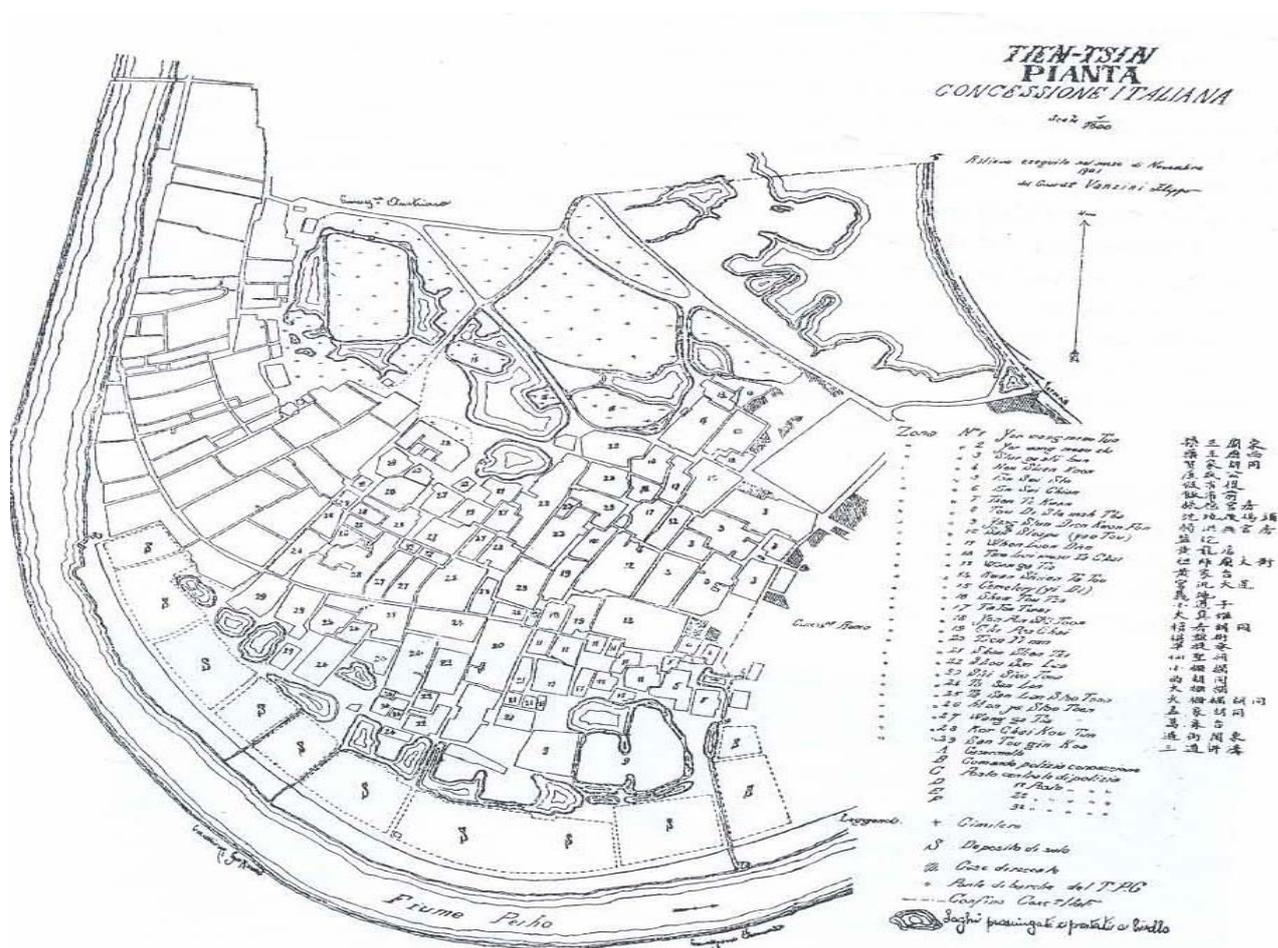
34 参见 G. 勃卡：《19 世纪的意大利与中国》，第 157—188 页；皮斯托雷泽：《意大利天津租界》，第 305—306 页。

35 西西蒂—苏里阿尼：《意大利在天津的租界》，第 562 页。

36 见卢多维奇欧·诺琴蒂尼：《欧洲，远东和意大利在意大利的利益》，米兰：希普利，1904 年（Lodovico Nocentini, *L'Europa nell'Estremo oriente e gli interessi italiani in Cina*. Milano: Hoepli, 1904）。

纳·德尔·菲洛 (Giovanni Vigna del Ferro)<sup>37</sup>。就连当地报纸，如热那亚的《贸易信使报》(Corriere Mercantile)，都支持这件事，它进而变成了热那亚船东的正式声音，这些船东促进了作为一个机会之地的中国形象。<sup>38</sup>

### 租界的范围及天津的地位



大多数著述都认为最初被割让给意大利政府的区域有大约 0.5 平方公里<sup>39</sup>。加阿科末·德·安东内利斯 (Giacomo De Antonellis)<sup>40</sup>认为它有 447647 平方米，与此同时，天津大学建筑学系<sup>41</sup>的一份资料提到其有 46.26 公顷。另一份中

37 约翰·维格纳·德尔·菲洛：《意大利与中国问题》，载《政治与文学杂志》，1901 年 10 月 (Giovanni Vigna del Ferro, L'Italia nella questione cinese, Rivista politica e letteraria, October 1901)。

38 发表在《贸易信使报》中的社论有：《意大利的对华政策》(La Politica Italiana in Cina)，1899 年 5 月 3 日；《离开部队到中国——狂热的示威游行》(Partenza delle truppe per la Cina. Entusiastiche dimostrazioni popolari)，1900 年 7 月 20 日。

39 见皮斯托雷泽：《意大利天津租界》，第 306 页，在其他中。

40 加阿科末·德·安东内利斯：《20 世纪意大利在中国》，载《华人世界》，19 号，1977 年 7—9 月 (Giacomo De Antonellis, L'Italia in Cina nel secolo XX, Mondo Cinese n. 19, July-Sept. 1977)，第 52 页。

41 引自网上资料《天津的九个租界》，<http://www.wayabroad.com/tianjin/text/text23.htm> (获取资料时间为 2006 年 4 月 21 日)。

文材料显示其面积为“714 亩或 722 亩”<sup>42</sup>，折算成公顷，分别是 47.62 或 48.15 公顷；还有一份中文材料称意大利租界在建立时（1902）大约是 771 亩（51.42 公顷）<sup>43</sup>。

从南边河流到北边火车站，这一区域包括 4 个部分：

1、一块被用作盐床的高地（大约 100000 平方米）。领事菲莱蒂解释说这是由于围绕盐床进行的挖掘工作形成了一系列壕沟，壕沟很快就变成了“臭水”池，“村子里的男孩子经常在里面洗澡”<sup>44</sup>。

2、位于租界中心地带的中国村子（大约 200000 平方米），有 1000 个住户（海军中尉马里奥·米凯拉尼奥利（Mario Michelagnoli）报告说有 867 座房屋<sup>45</sup>，主要是棚屋，由盐工建造。菲莱蒂对这些棚屋的描写揭示了居民的贫困程度：“不幸”、“贫穷”和“困乏”等等是一些被用于描述他们的段落中常见的词汇，大约有 17000 名中国人。

3、村子北部是最差的地区，这里有沼泽地，水深达 3—4 米，冬天完全封冻。

4、在沼泽地的稍高处，居民用来埋葬他们的死者。因此这块土地呈现出了“荒无人烟，遍地坟茔”的景象。一般地，在意大利人的描述中，这个第 4 部分地区多与“坟墓问题”联系在一起。

意大利方面的著述强调这块注定要成为意大利租界的土地的恶劣条件。类似的描述也体现在其他租界上。例如《中国时报》（*Chinese Times*）杂志的编辑、英国传教士宓克（Alexander Michie）就把英国和法国在 1860 年获得的租界描写为：

“沉闷的土地，在其区域内有废旧的码头、小菜园、烂泥堆、渔民、水手及其他人居住的矮棚。这些不幸群体的肮脏棚屋被狭窄的潮汐沟渠逐一隔开，沟渠旁边蜿蜒着窄小和失修的小路。这两个类似的新拓居被污秽和有害的沼泽地环绕，而在稍微干燥点的高地上则有数不清的许多代人的坟墓。”<sup>46</sup>

对法国租界的描述也包含着对当地居民的贬抑：“在这块肮脏的土地上，有池塘、卷心菜园、储存水果和蔬菜的暖窖以及粗鲁、邪恶和目无法纪的人群。”<sup>47</sup>宓克对美国租界的描述也是一样：见不到房舍，大部分地方都是结冰的水洼。<sup>48</sup>

---

42 李文新：《意租界》，载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天津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35 页。

43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第 209 页。

44 菲莱蒂：《意大利租界》，第 14 页。

45 见尼考莱塔·卡尔达诺、皮尔·路易吉·鲍茨欧主编《在去天津的路上——意大利与中国两千多年的关系：一个在中国的意大利居民区》，罗马：甘杰米，2004 年（Nicoletta Cardano, Pier Luigi Porzio (eds.) *Sulla Via di Tianjin: Mille Anni di Relazioni tra Italia e Cina. Un quartiere Italiano in Cina*. Roma: Gangemi, 2004），第 26 页的报道。

46 宓克（Alexander Michie）是《中国时报》的编辑，后者为天津的第一份报纸，转引自 O. D. 拉斯姆森：《天津——历史图说》，天津出版社，1935 年（O. D. Rasmussen, *Tientsin – 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 Tientsin Press 1925），第 37 页。

47 同上。

48 同上。

F. C. 琼斯强调租界区的恶劣条件，连续不断的洪水威胁以及维修堤坝的高额成本。例如他提到，在英国租界进行所谓的外墙扩展，需要移走数百万立方英尺的淤泥。琼斯因此总结到：“让外国人同意接受这样一块没有任何价值的租地，中国政府也许同样有理由高兴。”<sup>49</sup>

这些不断提到的主题一方面有助于论证占领租界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强调外国势力在其相关区域内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清政府之所以令人难以相信地乐意接受 1860 年的条约，恰恰因为外国列强将要占领的只不过是一些“没有任何价值”的土地。对于向中国进行的经济渗透而言，天津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它座落在人口稠密和物产丰富的中国北方平原，邻近大运河的北部终端海河，居于大沽—天津—北京的轴线上。天津还是北京的传统港口，而北京则位于其西北不过 120 公里（72 英里）的地方。在一些材料中，在论及天津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时，人们常常提到北河而不是海河，认为：“天津位于从大沽口到北河之间大约 37 英里（60 公里）处。”<sup>50</sup>实际上，北河、永定河以及其他一些支流在天津汇聚成了海河。历史上，天津的商业、军事和最终的战略意义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得以确认：从国内情况来看，天津的重要性体现在明朝永乐（1425）年间被建城有围城的城市一事上；国际上看，其重要性体现在第一位到达北京的荷兰使臣（1655）的描述中：“人口稠密、贸易发达，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几乎找不到同样的商业景象；无论哪里来的要到北京的船，大都先到达这里，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转运贸易机会，这在城市建成之前就得到频繁利用了。”<sup>51</sup>它最初的名字叫天津卫，可以被理解为“通往天堂的桥梁的卫士”，这里清楚地提到它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它保卫皇帝（天子）统治下的北京的角色。在 19 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天津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古老的、有围墙的城市，经过不断的破坏和重建，转变成为中国北方一个最重要的商业城市的过程。这主要取决于它在经济、道路和运输方面的战略位置：天津不仅成为不断扩展的铁路网的中心，也成为一个由水运连接其他亚洲地区的主要的国际贸易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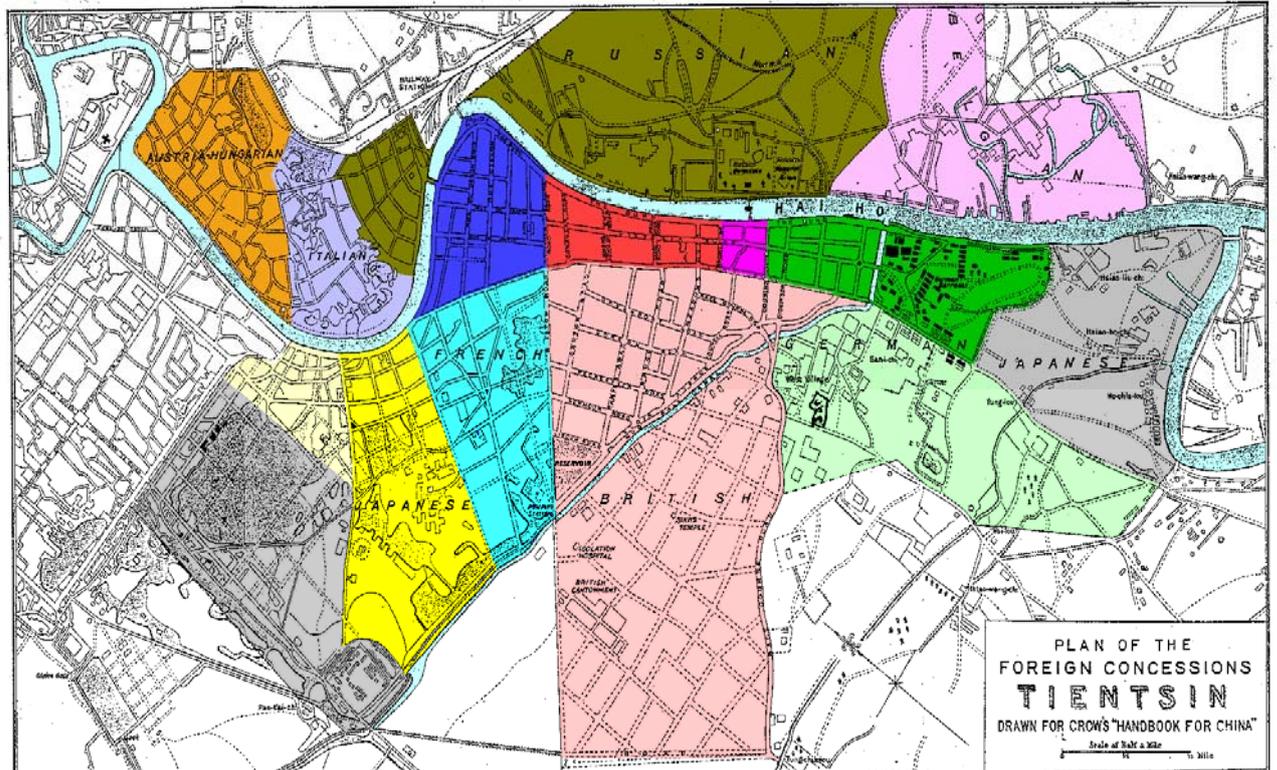
## 外国租界的历史

---

49 琼斯：《上海和天津》，第 119 页。

50 <http://www.geocities.com/Eureka/Plaza/7750/tientsin01.html> 资料获取时间为 2006 年 5 月 2 日。

51 拉斯姆森：《天津》，第 9 页。



到十九世纪中叶，天津被辟为对外开放的高埠，其重要性由一面连通北京（1897 年开始）和一面连通山海关<sup>52</sup>及满洲里的铁路系统的形成而得到进一步加强。英国、法国和美国于 1860 年最早地在天津建立了租界。作为 1860 年 10 月 18 日《北京条约》的后果，天津被开放为一个条约口岸，而《北京条约》则是在英国和法国军队占领了首都及火烧圆明园之后由清政府签署的<sup>53</sup>。

条约确立了以下规定：

1、对于英国来说，1860 年 10 月 24 日签订的大不列颠与中国和平友好条约（又称《续增条约》）第 4 款规定：

“一、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画一无别。”<sup>54</sup>

52 山海关，“山和海之间的关口”，指的是长城东端与渤海相遇的地方。

53 参看《额尔金勋爵和王的母亲》，载奈格尔·卡梅龙：《夷人与官员—西方游客来华一千三百年》，纽约：瓦尔克/维特黑尔，1970 年，1999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重印（Lord Elgin and Wang's Mother, in: Nigel Cameron, *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lers in China*, New York: Walker/Weatherhill, 1970, reprint. Oxford U.P. 1999），第 345—360 页。

54 爱德华·赫斯勒（Edward Herslet）：《英国与中国和中国与其他外国签定的条约及文书》，伦敦：霍姆生，1896 年（Edward Herslet, *Treaties, & c.,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And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London: Homson, 1896），4 卷本，第 1 卷，第 50 页。（中文翻译根据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第 145 页）赫斯勒负责英国外交部的记录。

2、对于法国来说，1860年10月25日签订的中法和平友好条约第7款规定：

“从两国大臣画押盖印之日起，直隶省之天津府剋日通商，与别口无异，再此续约均应自画押之日为始立即施行，毋庸俟奉两国御笔批准，犹如各字样列载天津和约内，一律遵守如此。大法国水、陆二军，俟在天津收银五十万两，方能退出天津，屯佔大沽、烟台二口，待至中国将所赔之银全数交清后，所有法国武弁佔踞中国各地方均应退出境界。然任水、陆各大将军于天津紮兵过冬，而俟所定赔補之现银给清后，则撤大军退出津郡。”<sup>55</sup>

最初，英国的租界有 27.6 公顷，法国的有 21.6 公顷，美国的（1880 年被英国接管，但美国仍保留有一些权力）有 7.86 公顷。在 1895 和 1902 年间，它们和日本（1896—1898 年取得 100.02 公顷，1900 年又获得拓展）、德国（1895 年 10 月获得 62.6 公顷）和沙皇俄国（328.44 公顷）的租界以及之前在中国从未取得租界的国家，包括奥匈帝国（61.8 公顷）、意大利（46.2 公顷）和比利时（44.85 公顷）的租界连成一片。这些后来的国家继之建立了设备齐全的租界，包括有自己的监狱、学校、兵营和医院。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也都利用了战后的有利地位扩大了自己的租界。

欧洲租界的总面积覆盖了5英里的区域，区域内的河流也被其控制。<sup>56</sup>

国家	日期（年）	面积（公顷）
英国	1860, 1897, 1903 [1901] 到 1945	400 [368.94]
法国	1860 [1860-1], 1901 [1900] 到 1945	180 [171.60]
美国	1860 到 1880	8.7 （被英国接管）
德国	1895 [和 1901] 到 1919 [1917]	280 [245.04]
日本	1898 [1900] 到 1945	144 [124.40]
俄国	1900 到 1924（设定了计划但从未完成）	365 [328.44]
意大利	1902 [1901] 到 1945	51 [46.26]
奥匈帝国	1902 到 1919	69 [61.80]
比利时	1902 [1900] 到 1929	36 [44.85]

55 同上，第 290 页。（中文翻译根据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 148 页）。

56 下面的图标似乎去除了日本在 1900 年获得的一到两块另外的区域。资料来源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总计 1533.7 [1391.33]
--	--	------------------------

如果考虑到租界对中国的深远影响,《辛丑条约》的象征意义可以部分地和1884—1885年柏林会议<sup>57</sup>相比,那次会议的结果是把非洲瓜分为可开发的殖民地。欧洲殖民列强“分割”非洲或者“争夺”非洲大陆内部的控制权的行动与开始于1860年(尽管最初先例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于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的争夺租界及占领势力范围的行为是相互关联的,尽管实际上中国从未被彻底地殖民化或者被彻底“瓜分”领土。然而,在1901年的天津,有着总计区域达5英里的8个租界,这显得有一些不同寻常。按照由孙中山系统阐述的传统叙事,半殖民地状态(被看作是单一殖民国家霸权的对立面)经常被说成是本土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和民族自治主张的障碍。相反,罗芙芸(Ruth Rogaski)则认为天津的特殊性使其应获得“超级殖民地”<sup>58</sup>的称号。这个解释与孙中山基于把中国说成为“半殖民地”<sup>59</sup>的声明而把中国定位为“次殖民地”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的许多著述都支持“半殖民地”观念,经常还结合着“半封建社会”<sup>60</sup>观念。很明显,罗芙芸的“超级殖民地”的形象更符合天津政治和文化的错综复杂性。同时,我将根据在1860—1945年间多元的殖民空间和殖民权力话语对其加以补充,尽管这看起来有无视或忽视天津多层次的复杂身份,以及引入了多种殖民话语和殖民实践的多种代理人存在的趋势。

### 租界, 区 (Neighbourhood) 还是异托邦 (Heterotopia)

在我选用的材料中,有一本新近出版的书,书中有一个用双语表达的目录,其原始的意大利标题可翻译成下列英文:“On the Road to Tianjin: One Thousands years of relations between Italy and China. An Italian neighbourhood in China.”中文标题则非常简练并与意大利语的副标题十分吻合:“一个在天津的意大利区”。而在这本书的封面却出现了日本儿童;把日本人误认为中国人,这是一个明显而又令人难堪的错误。

这本书提供了从1902年到1930年代的大量照片和档案资料,它是以先前的有关意大利租界的学识为基础而形成的。不管怎样,历史学家不会不注意到下列企图的一直存在,这就是消除意大利在天津占有一个租界而不是一个区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观念。如果有人争论说,租界这个合成词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殖民状态(而colony一词在中文中的意思才是殖民地)或一个新拓居地

57 英、法、德、葡萄牙和意大利等14个国家于1884年11月15日至1885年2月26日在柏林召开会议。

58 罗芙芸:《天津卫生学的现代性》,载周锡瑞:《重造中国城市—现代性与民族认同性,1900-1950年》,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9年(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in Tianjin*, in: Joseph W. Esherick,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第30-46页。也见罗芙芸:《卫生学的现代性—卫生和疾病在中国条约口岸的含义》,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59 孙中山:《国父全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1年,第1卷,三民主义教程2:19。

60 见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天津的洋行与买办》,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页。

(settlement)，那么我们绝对不能忘了租界这个合成词还体现着“租借领土”的思想并包含着区域划分的观念。<sup>61</sup>中国的历史学家从行政、司法、警察和财政角度出发强调租界就是“国中之国”<sup>62</sup>。从语言上把“租界”置换为“区”属于典型的殖民过程的重新命名，这意味着为了把内容和背景神秘化而对形式进行修改。这个过程就是我所定义的良好殖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会产生使殖民主义形象变温和的效果，其目的在于制造一个相当正面并且经常令人自我陶醉的意大利殖民主义形象。意大利语汇中的“quartiere”概念可以被翻译为中文的“区”，不仅具有特定居住区的意思，还具有以邻近和熟悉为特征的社区含义。它是指这样的一个场所或区域，在那里，居住者分享着一个共同占据的空间，有时还分享着某些习惯和风俗，甚或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相互联系。实际上，力求说明意大利租界属于一个“区”的企图似乎符合整个事业所宣称的双重目标：“促进和扩大两国之间的商业关系，向诸如中国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家输出和传播那个时代最好的城市、建筑和艺术形象。”<sup>63</sup>



图四：“2006 中国意大利年”宣传图片 [www.yidalinian.org](http://www.yidalinian.org)  
资料获取时间 2006 年 6 月 10 日

如果把意大利租界“想象”成“意大利区”，对该租界的下列重现就会得到允许了，这就是该租界“见证了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在那个时候的共同工作，而这种共同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在60年后的今天又被人们以某种方式重现发现和重现评价了。”<sup>64</sup>引导我阅读这些材料的问题正好是他们的“价值”和“意义”趋向。当混杂被意大利材料明显地省略时，强调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共同工作”就会体谅虚假的“区”的重现，就会认为它是从中国皇帝那里“接收”<sup>65</sup>的，就会遮蔽意大利在中国的殖民经历。这种做法与当前中国政府把租界时代重现为天津国际化的开始的意图完全一致，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些全球化资本主义种子，而不是

61 “租”的意思是“租借或者租赁”，“界”的意思是边界，来自合成词国界（国家的边界）。

62 尚克强、刘海岩：《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页。

63 尼考莱塔·卡尔达诺、皮尔·路易吉·鲍茨欧主编《在去天津的路上》，第7页。

64 同上。

65 同上，第7页。

丑化它们。最近，天津市政府开始了对现在被称为“意式风情区”<sup>66</sup>的前意大利租界的整修工程。“意式风情区”的表达方式可以被翻译成“意大利样式的风景区域”，官方意见是“意大利商业点”，它淡漠了殖民主义的历史，把重点放到以先前殖民建筑为商机来争取国外投资者和国内消费者上。<sup>67</sup>

可以把前意大利租界定义为：以对立因素并列为特征的空间，这就是福柯所讲的异托邦（heterotopia）。福柯对异托邦的发现起源于他对一些场所的思考，“这些场所在与所有其他场所发生联系时有着稀奇古怪的本质特征，但它们是以诸如怀疑、压制或发明它们碰巧设计、反映或表现一组关系的方式进行联系的。”<sup>68</sup>福柯认为这些场所有两种类型：乌托邦和异托邦。意大利的天津租界，和所有其他外国租界一样，都不是乌托邦，因为它不是作为一个对现存社会进行理想化设计而虚构的非真实空间。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租界都可以被充分定义为多层次的异托邦。因为租界实际上（de facto）通过贯通跨语言的实践<sup>69</sup>，已经落入福柯的“真实区域—确实存在的区域，而且构建于社会的根本基础之上”<sup>70</sup>的范畴，它有些像对立的场所，是以某种有效方式扮演的乌托邦。其中，它的真实场所同时又会被提出异议、争论和反转，而所有其他的真实场所都能在文化中发现。”<sup>71</sup>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定义是否对后殖民主义或后全球化时代的天津仍然适合，就像福柯所言，异托邦存在于“（……）所有空间之外，尽管有可能表明它在现实中的存在。”<sup>72</sup>如果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建造一个集体空间的话，天津的租界恰恰是“绝对真实”和“绝对虚幻”并列的典型例子。其中一点就是，殖民地—母国的曲面镜功能（建立在反射、感知扭曲和投影复制机制基础之上）允许殖民主体尽情表演。

人们今天在天津所游历的“意式风景区”既不是一个乌托邦的重现，也不是一个意大利的微型模拟。行走在前意大利租界“区”中，人们将会看到一个商业区：一个带有全部经过改良的空间及其相关权力话语特色的全球化和地方化实体。“意式风景区”的氛围更像一个开放的商业街，而不是一个开放的博物馆。命名和指示“意式风景区”的标记正在基督化这个空间，试图指出这个“意大利式”的“真实性”。然而，矛盾的是，它们是对一个历史先例的回忆：在先前的场所被毁掉之后由 1901—1947 年意大利殖民政权所强加的街道标志依然狂妄自大地存在着；城市样式被据为己有和重新使用。在那些日子里，利加纳·爱伦娜（Regina Elena）和科索·维多利奥·埃曼努埃尔三世（Corso Vittorio Emanuele III）广场就是声明在意大利租界中的“真实性”的标记，还有以同样

---

66 当我和一些中国学者讨论合成词“风情区”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和合成词“红灯区”有着令人惊奇的关联。企图通过重新命名和改造殖民空间来掩盖历史的做法实际上只不过是形式的滥用。

67 《天津意大利风情区建筑与整修的历史与回顾》，北京：Ed. Graffiti, 2006 年。

68 福柯：《另类空间》，第 47 或 755 页。

69 我从吕迪亚·刘（Lydia Liu）那里转引了这个定义，刘使用这个定义来说明在不同语境下重创词语意义的重要性。吕迪亚·刘：《跨语言实践—1900-1937 年中国文学、民族文化和翻译的现代性》，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 年（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 P., 1995），第 24 页。

70 但在这篇文章中还应该加上：殖民地社会。

71 福柯：《另类空间》，第 47 或 755 页。

72 同上。

的方式在英国租界中标志着维多利亚路（今解放北路）和维多利亚公园以及公园内的戈登礼堂的指示牌<sup>73</sup>。

## 租界的重组

历史材料对这块注定要成为意大利租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重现。驻北京的皇家大臣萨尔瓦葛公使认为它是一个最好的区域，并且明确指出了它所具有的快速和成功开发前景。意大利驻天津的领事卡维拉尔·鲍马（Cavalier Poma）则提出了一种不同的重现，他注意到这个地方不仅有众多的中国人住宅，而且还有墓地和沼泽地，其发展前景似乎并不怎么乐观。显然，天津卫戍部队指挥官海军上尉瓦利（Valli）是军事占领租界行动的负责人，他选择“去占领其次最好的东西”（用意大利语来说就是：*quanto restava di meglio*），很可能这是其他殖民国家留下的唯一一块最好的土地了。意大利的一个材料指出：英国人必然想为他们自己保留最好的区域。<sup>74</sup>

占领租界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找到财源去解决墓地问题和开垦沼泽地。这里有两条途径：公家投资和私人投资。

1905年，意大利外交大臣批准了由海军大臣（Lord Lieutenant）阿多尔夫·岑希提（Adolfo Cecchetti）为意大利租界设计的城市规划。首先是平整土地，这就意味着不仅要迁出坟地，还要排掉沼泽地里的积水。

1908年7月5日，意大利租界举办了一场公开拍卖会<sup>75</sup>，目的在于吸引潜在的买家对租界进行分配。与此同时，还发布了由领事达·维拉（Da Vella）签署的管理租界的规章制度和第一套租界“建筑编码”（在这里，人们第一次用意大利语表达了“区域”或“区”的概念）。<sup>76</sup>建筑编码明确显示了要消除所有中国印记（identity）并以铺设西方风格的道路、建筑仅两层高的住宅楼以及“欧洲时尚的优雅（用意大利语表示就是“signoril”）住所”的规划附加物取而代之的意图。建筑规章明确规定：

“（……）所有面对维多利奥·埃曼努埃尔三世路的建筑都必须是欧洲风格，并且只能由具有良好品格和身份的欧洲人或者道台或别的经意大利皇家领事许可的高级中国官员拥有。”<sup>77</sup>

---

73 建于 1889 年，位于公园的北部，是为了纪念英国将军查尔斯·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而建的；戈登曾经帮助清政府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

74 参见 Roberto Bertinelli: 《1900—1905 年意大利在中国的存在》，载《东方学杂志》，第 LVII 卷，1983 年（Roberto Bertinelli, *La Presenza Italiana in Cina dal 1900 al 1905*, *Rivista di Studi Orientali*, vol. LVII, 1983），第 34 页。

75 参见意大利皇家领事：《天津—中国—1980 年 7 月 6 日在天津意大利皇家租界举行的土地拍卖》（Royal Italian Consulate. *Tientsin-China. Sale by Auction of land in the Royal Italian Concession in Tientsin*, 6 July 1980）。

76 参见 ASD MAE: 1891—1916 年中国政治系列 b（ASD MAE, *Serie Politica P Cina 1891-1916 b*），第 426—427 页。

77 在天津的皇家意大利租界。本地土地章程和基本规则，建筑规章，条款一、道台相当于负责某一巡回区民事和军事事务的军官，而该巡回区包括两个以上行政区划单位（府）。可以被翻译

其他关系到建筑的规则同样强调外国或者半外国风格的重要性，同时也授权领事“全权处理交由他裁决的不符合计划的建筑改造以及出于安全和卫生考虑的修缮工作”。更有甚者，它明确规定“领事享有摧毁任何不严格符合建筑规则的建筑物的全权。”<sup>78</sup>大体说来，我们可以观察到规则有把道德、卫生和社会阶级地位联系起来的趋势。与此相伴的是执行对中国居民行动的限制，其“婚礼、丧葬及其它仪式”（24，10）都需要事先获得的批准。其他与道德—卫生和现代性相关的例子还有：所有形式的公众娱乐活动必须经警察当局批准（24，13）；开设中国剧院需要经特别许可（23），其经营者必须：“保证演员的道德品质和公共安全”。此外还要求“租界里部分没有被征用房子的中国居民”必须保持他们房屋以及“他们房屋前面的道路”（24，1）的清洁。歧视的另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建立“任何有不良品质的本地人都有可能被驱逐出租界”（24，13）的固定规则，执行这种规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1908年的公开拍卖遇到了一些困难，逐渐明朗开来的是私人赞助只会跟随在公家投资之后，反之则不成立（vice versa）。而且直到1912年，意大利政府才最后决定拨款400000里拉去促进租界的开发。<sup>79</sup>

在从1912—1922年的10年间，意大利租界建造了所有街道、领事馆（1912）、医院（1914—22）和公议局办公楼（1919）。



图7. 意大利公议局办公楼

意大利文著述用极其肯定的词汇描述了这个开始变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意大利租界，它们对这个进步的城市开发计划发出一致的赞扬，该计划把卡罗·斯福尔扎（Carlo Sforza）伯爵等人在1912年4月22日所描述的状态——“一个被腐烂的沼泽地环绕的中国村庄，目光所及之处可以看到成排和成堆的中国棺材”——改变成了一幅截然相反的景象；在这里，“沼泽地已经大大缩小了，租界内再也找不到一处坟茔”。

---

成为“Intendant of circuit”。与条约口岸负责通商事务的道台打交道的外国领事和专员级别相当于道台。

78 同上，第三款，XI。

79 第707号法令的生效时间为1912年6月30日，授权事先从存款和贷款基金中拨款。

租界被认为有“展示意大利艺术的作用，它所用的装饰和建筑材料都是从母国进口的”，对于“最具代表性的东西，比如公共建筑和座落在埃琳娜女王广场（Queen Elena Square）中心不朽的人造喷泉”来说，尤其如此。<sup>80</sup>

特别是包括新的街道和欧洲风格房子在内的城市建筑获得了无条件赞誉。通过分析意大利文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经常被提到的领事馆公寓—斯福尔扎把它描述其为漂亮的小别墅（grazioso villino）—以及意大利公议局办公楼似乎是殖民地建筑的最好例子，它们被重现为权力的象征，表达了空间的认同性，并使一种民族话语在超级殖民主义的空间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需要被消除的是意大利领事馆馆址多变的历史，这一历史事实上有点像奥德赛长期探索的意味：意大利领事的办事地点最初设在英租界，后来在 1902—1912 年间，它先是临时设在一座中国房舍内，后又搬到兵营区。兵营区内的领事馆是奉海军之命建立的，它看起来就像“一个临时性大帐篷，考虑到现在天津的形势，只能暂且如此，直到时间允许我们找到办法建立其他领事馆为止。”<sup>81</sup>

意大利公议局办公楼系由已进驻天津相当长时间的艾吉迪奥·马佐利（Egidio Marzoli）公司建造的，属于新文艺复兴风格<sup>82</sup>，有明显仿照意大利 15 世纪别墅的做法，其特征是外形方正、地基牢固、小塔楼四坡拱顶。这一建筑物被看作是意大利在天津存在的确凿证明。1925 年，居住于租界的建筑师勃内迪（Bonetti）草拟了一个通过把阳台改为招待房间来扩充建筑物使用空间的设计图。该建筑物在 1990 年前后被毁坏，而意大利领事馆则变成了河北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办公场所。

每个租界都通过开发其居民区来扩大殖民权力（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利于富裕的中国居民），反映、再现以及代表各个国家的传统。就意大利而言，向中国输入新文艺复兴风格可以被解释为肯定其声望和它作为殖民国家与其他殖民国家处于同等地位的途径。实际上，一种自觉的“新文艺复兴”风格已经迅速扩散，并开始在全欧洲流行，特别是在 1840—1890 年代。到 19 世纪末，它已成为世界上大大小小城镇主要街道上的普遍景观。意大利的新文艺复兴风格同样展现在法国租界，尤其是圣路易斯（St. Louis）教堂，它内部属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风格，正面则属于罗马文艺复兴风格。这种风格也能体现在前国华银行、中孚银行、大中银行和华意银行上，它们都坐落在今天的解放北路。

建立租界，并把它作为意大利建筑的一个缩影进行展示，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的做法完全相同，它有助于在国内外提高新建立的意大利国家的国际认可度。外国记者如 H. G. W. 武德海德（H. G. W. Woodhead）在 1934 年写道：

---

80 尼考莱塔·卡尔达诺、皮尔·路易吉·鲍茨欧主编《在去天津的路上》，第 34 页。

81 转引自《在去天津的路上》，第 36 页。

82 类似的建筑在英国被称为“意大利宫殿的文艺复兴”。为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对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建筑奇迹的赞颂所激励，转变出现在 1840 年左右，因为“学者和设计者的注意力和意识被争论和复原工作所吸引”。罗萨那·鲍沃尼：《复兴文艺复兴—19 世纪意大利艺术中对过去的利用和滥用》，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 年（Rosanna Pavoni. *Reviving the Renaissance: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Past in Nineteenth-Century Italian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第 73 页。

“对所有外国人来说，德国租界（……）是最好的居住地（……）英国租界和其扩展区有最重要的外国银行、办事处和商店以及大量的中国人口（……）意大利租界（……）开始成为最受中国隐退军政官员欢迎的富丽堂皇的居住地。”<sup>83</sup>

1985年，地理学者约翰·韦斯顿（John Weston）在其对开普敦和天津的比较研究中指出：“在第一次走访中国城市的时候，在前租界区中遇到的建筑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巴黎市区、萨里郊区或者巴洛克式的萨尔斯堡，这的确令人感到不安。”<sup>84</sup>

在意大利殖民时代以及其后的文献中，“不安”的感觉被完全忽视，取而代之的则是过分的自恋，尤其是在法西斯时代。<sup>85</sup>

分析1949年前后城市形象的建设和破坏过程是一个很好的手段，通过它不仅可以理解对天津的一个区域造成影响的物质改造，而且也可以理解在天津租界区重造空间的全部政治因素。支配意大利殖民话语的或隐或显的价值观念清楚地通过为租界街道选取新名称行为暴露和显示出来。例如，选择像Matteo Ricci（利玛窦，今天的光明路，意思是光明之路，和黑暗对立；以国家“英雄”埃尔曼诺·卡罗图（Ermanno Carlotto）<sup>86</sup>的名字命名的军营就座落在这条路上）这样的名字就揭示了运用历史先例来论证中国与意大利之间长期联系的存在合法性的意图。

殖民建筑的自然毁坏、复原和与历史或政治相关的重新占用过程在天津的例子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就像通过为租界街道进行重新命名的行为所展示的意图一样。租界时代以来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座落在与河平行的今日解放北路上。而建于1908—1916年间的意大利风格的别墅则座落在今日民族路和自由路周围，这些路名显然是在1949年以后出现的。根据今日地图所体现的新空间地理，意大利租界北面是北安路和自由路，南面是海河，东面是五经路，东北是兴荣街和建国路。这些街道的新名称明显象征着1949年后中国对前租界地区的再征服。

### 良性殖民主义的映象

在法西斯时代，带有理想化色彩的良性殖民主义宏大叙事达到了顶峰，它特别强调租界地区过去的暗淡与现在的辉煌这种一分为二的显著差别。过去总是被

---

83 H. G. W. 武德海德：《一个新闻记者在中国》，伦敦：赫斯特和布莱克特，1934年（H. G. W. Woodhead, *A Journalist in China*,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934），第65页。

84 约翰·韦斯顿：《破坏殖民城市？》，载《地理学评论》，第75卷，1985年7月第3期（John Weston, *Undoing the Colonial City? In: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75, No., 3 (July 1985)），第341页。斜体字为增加的。

85 参看：皮斯托雷泽：《意大利天津租界》，第305—310页；乌格·巴希：《意大利与中国—历史上的外交关系与贸易》，莫德纳：E. 巴希和尼珀迪，1929年（Ugo Bassi, *Italia e Cina: Cenni Storici sui rapporti diplomatici e commerciali*, Modena: E. Bassi & Nipoti, 1929）。

86 卡罗图是海军上尉，1901年6月15日在和海军一起护卫所谓的意大利领事馆时死于天津。德·安东内利斯指出有十二个意大利士兵死于1900—01年间的军事远征。

描绘成落后和无望的，现在则被重现为具有所有“现代性”成分的，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自我改进。1936年，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建立帝国梦想<sup>87</sup>的精神一致，工程师里纳尔多·路易吉·博尔尼诺（Rinaldo Luigi Borgnino）写了一篇洋溢着赞美之情的文章，坚决反对放弃意大利租界。<sup>88</sup>他相信拥有这块租界的合理性存在于由意大利人展示出来的崇高教化动机中，也体现在这块“小地方”的进步“演变”中。在描述该地区在意大利占领以前的情形时，博尔尼诺所使用的形容词主要有：悲惨的、道德败坏的、荒凉的和悲哀的。但是在意大利人占领后，意大利租界就成了展示意大利风情的舞台和现代与卫生的模范。博尔尼诺所强调的成就有先进的民用设施和基础设施，如宽广的马路、优雅的建筑、现代的医院、所有房屋都配备方便适用的电器和干净卫生的水源、先进的排污系统及公共景观等。博尔尼诺还提到当地一家英国报纸把新建的意大利租界称为“所有租界中最舒适的居住区”的评价。<sup>89</sup>他补充说，所有邻近的租界都因此而采取了同样措施来改善它们的总体面貌和环境。博尔尼诺撰写文章的最终目标体现在杂志编辑为向读者推荐而写的评论中，该编辑盛赞博尔尼诺在中国直接和长期的经历，并明确作出下列论断：“很有必要去了解祖国的一切，并到处实施它，结果必然是更大的自豪。”<sup>90</sup>

博尔尼诺对于制造意大利租界的成功形象明显地怀有个人动机，因为他是由工程师丹尼埃尔·拉斐洛尼（Daniele Ruffinoni）所设计并于1922年12月21日完成的医院的建筑主管。他同时也负责意大利公议会办公楼的设计，他的设计理念是：“建造一个意大利艺术的完美范例，一个思想、技术和物质的展示台，一座具有广泛时代意义的典型建筑。”<sup>91</sup>在其文章中，他大量引用了领事菲莱蒂在1921年写作的官方报告所提供的信息，但却有意将菲莱蒂对意大利公司的经济机会的强调（表现为对中国“巨大而原始的市场”<sup>92</sup>的渗透）转变为对建筑的强调，把它们看作是意大利租界声望和威信的象征，同时也暗示着“意大利精神”的胜利。考虑到他本人参与租界建设情况，他的语调和其所选择的方式具有一种自我庆贺的倾向。我认为，博尔尼诺言论中最显著的成分是试图回避殖民主义主题，这显示了对意大利帝国认同性的热切渴望。

另一个在发表于法西斯政权时代的著作中不断出现的关于意大利租界的主题是把意大利重现为殖民国家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地位。这种叙事趋向的最著名例子

---

87 1936年5月9日，墨索里尼宣布创建帝国。这件事发生在巴多格利奥元帅（Marshall Badoglio）率领的意大利军队通过八个月军事侵略，最终占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三天后。

88 R. 博尔尼诺：《意大利在中国的“租界”》，载《奥古斯塔亚》，1936年，第363-366页（R. Borgnino, *La “Concessione” Italiana in Cina. Augustea, 1936, 363-366*）。

89 同上，第365页，把租界和区的概念模糊化是殖民主义的逻辑。

<sup>90</sup> 引自《在去天津的路上》，第44页。

<sup>91</sup> 引自《在去天津的路上》，第44页。

<sup>92</sup> “（中国）是巨大的等待可向人类活动开放的经济开发的处女地，并且克服困难的努力可被证明是正当的（……）所有由于商业和工业发展而自觉十分强大的国家，都对这个巨大而又未开发的中国市场兴趣昂然，都要抓住每一个有利的机会来推倒保护这一宝藏的围墙，力避在开发这个巨大的新市场中落后或者遭到排挤。”菲莱蒂：《意大利租界》，第8-9页。

是 1927 年 4 月 26 日乌格·巴希博士在博洛尼亚法西斯大学发表的题为“意大利与中国”的演讲。<sup>93</sup>在重写和篡改了东西方的全部历史之后，巴希声称：

“最初，即便是在中国，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也有意大利人。他们由于对探险的渴望和出于在中世纪不为人知的神秘感觉而去到那里，他们建造了轻便坚固的意大利船舶来应对朝向非洲和美洲的新航线，寻找传说中的圣布兰达诺（Saint Brandano）岛或寻找黄金。”<sup>94</sup>

巴希提到了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1245—47）、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61—95）和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并以下列结论达到了其诡辩的顶峰：“我们意大利人的高贵后裔，曾为整个世界提供了若干广阔的陆地和新的知识，与其他人相比总是，并且在所有领域，都居于第一位。”<sup>95</sup>

在巴希看来，英国的功绩在于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并结束了中国的优越感。<sup>96</sup>当他提到组织国际远征军去镇压义和团起义时，他把已故的埃尔曼诺·卡罗图描绘成国家英雄<sup>97</sup>，同时在与占据统治地位的良性殖民主义解说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强调意大利士兵是如何把自己同其他极其残忍并在“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造成了巨大差别的军队区别开来的。按照巴希的描述：“（……）意大利人像平常一样，为他们祖国的人道主义传统而自豪，并把罗马文明带给他们应该帮助和拯救的当地人。”<sup>98</sup>这里所谓的意大利人宽宏大量的行为是与中尉军医朱塞佩·梅塞罗蒂·本温努迪（1870—1935）提供的原始材料相矛盾的。在寄给母亲的 58 封信和 400 幅照片中，本温努迪充分描述了不同军队之间的关系，提到了肆意屠杀、掠夺及其他残暴行为。最后，他悲哀地承认：

“如果说我们的士兵比其他国家的军队造成伤害少的话，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尽管他们（意大利人）经常到各处去，但他们经常迟到，这些村子早就被抢夺和烧毁过了。少数的几次准时到场，他们的表现与其他人毫无异样。”<sup>99</sup>

巴希所重申的观点与 1921 年菲莱蒂在报告中阐述的立场<sup>100</sup>一致：“意大利不会错过在那个正在润养发展新全球命运的世界中把中国划分出来作为一个参与者

---

93 乌格·巴希：《意大利与中国》，1929 年。这个作家之前写过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政策和利比亚的殖民政府。参见参见乌格·巴希：《利比西议会》（*I Parlamenti Libici*），1924；《殖民政策编年史》（*Cronache di politica coloniale*），1928 年。

94 同上，第 9 页。

95 同上，第 10 页。

96 同上，第 12-13 页。

97 同上，第 15 页。

98 同上，第 16 页。

99 尼古拉·拉夫兰卡编辑《朱塞佩·梅塞罗蒂·本温努迪著〈意大利与中国的义和团：书信集（1900—1901）〉》。400 幅照片已经被收集保存在《梅塞罗蒂·朱塞佩·帕尼尼收藏的照片—马茨欧·戈沃尼集》（*Raccolte Fotografiche Modenesi Giuseppe Panini -Collezione Marzio Govoni*），摩德纳，意大利。

100 参见脚注 69，菲莱蒂：《意大利租界》，第 8-9 页。

和观察者的机会。”<sup>101</sup>他所有的描述都含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并且有意识地把意大利租界定义为意大利最伟大的非凡成就的陈列台，这些非凡成就包括市区建筑、医院和学校设施等。在巴希的演讲中，人们可以真切地察觉到对“意大利精神”修辞学比喻的积极肯定：租界变成了试验和改进作为一个显赫而又统一的民族的意大利集体认同的理想场所。巴希无条件地盛赞意大利传教会为“意大利精神”的中心，不仅提到天津，也提到了在被迫离开南京之后意大利传教士在汉口的努力。对巴希来说，意大利精神的转喻体现在天主教教堂里：这些在天地之间进行空间征服的阳性符号（masculine symbols）使人“回想起遥远的祖国，用最简单但同时也最典型的意大利风格”——即使它们可能会在外国的城市风景令人感到惶惑不安。巴希赞扬那些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默默无闻的传教士”，它们“以基督同时也以意大利的名义”在最遥远土地的灯塔上开启了拉丁人生动的人性之灯。”<sup>102</sup>巴希在演讲中对这一点作出了明确声明，尽管用的是插入语，他认为这是意大利精神中最深邃的动机。这也是他演讲的高潮和他的听众最需要保留意见的地方：“让一个意大利人忘掉他的祖国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意大利人如此堕落以至于应该以取消其国籍来作为极端的处罚。”<sup>103</sup>这种在海外肯定意大利观念的梦想有一种基本的补偿和反思功能：从“祖国”的观念转向“民族”的观念，以及以开除“国籍”进行威胁，巴希表现出了对法西斯政权争夺霸权图谋的肯定，首先是在国内，在墨索里尼已建立的帝国方案中梦想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这里的问题是，编造良性殖民主义的挑战性乐观主义宏大叙事可能无法掩盖为不断发生的体制失败所编造的欺骗性叙述，无法隐藏持续的、拼命追赶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尝试。

这种良性殖民主义的工具化自我反省可以从街道的重命名中明显看出。像阜姆（Fiume）或 特兰托（Trento）、的里雅斯特（Trieste）这样的名字的基质（matrix）属于意大利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修辞学，因为它们清楚地提到了意大利的统一进程（1871 年正式统一），并把重点放到对东北部“合理边界”（即特兰托、的里雅斯特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n）及其海岸城市阜姆）的收回上。这是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张干涉主义的动机：为了使这个国家变得完善，有必要重新获得这些边界地区。

在遥远的、理想化了的租界区域内，意大利民族主义的比喻被输出并被加以改造，这将为意大利国内的听众展示一种强有力的符号价值。这在工程师博尔尼诺所提供的下列重现中表现得特别清楚：

“24 米宽的维多利奥·埃曼努埃尔三世林荫大道是我们租界的主要街道。一条由一家当地公司控制的有轨电车线穿过这条林荫大道，该线路上的电车承载着从天津市其他地方到天津东站和其他租界的所有运输。显然，公共建筑应该已经矗立在林荫大道两旁了。”<sup>104</sup>

## 中文著述中的意大利租界

---

101 同上，第 20-21 页。

102 同上，第 29 页。

103 同上。

104 R. 博尔尼诺：《意大利在中国的“租界”》，第 363 页。

在直到 1980 年代末的中文著述中，意大利租界的重现与所谓的意大利良性殖民主义形象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大体说来，在中国人有关天津外国租界的研究中，意大利租界并没有被看作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大多数的时候仅仅是由于创造了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东方主义的建筑风格而被提到。

在《天津简史》中，只有 3 句话提到与中意关系相关的历史：

“光绪二十二十六（1900 年），意大利以‘占领国’的身份，援引同治五年（1866 年）中意《北京条约》，要求享受‘最惠国待遇’，在天津设立意租界。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意大利驻华公使嘎里纳与天津海关道唐绍仪签订《天津意国租界章程合同》，于海河北岸划定意租界。共占地七百七十一亩。”<sup>105</sup>

在少数比较详细的文章中，有一篇是以分析意大利租界的起源为开端的。作者纪华在第一段中就对想象的共同体设定了与意大利文资料显然不同的基调。Jihua 确认意大利作为八国联军的一部分的角色及其参与联军行动的军事性质：“八国联军在 1900 年入侵中国，攻陷天津和北京。意大利派出一支军队参加这场侵略战争，其军队驻扎在天津。”<sup>106</sup> 所用术语全都包含着武力意味，毫无疑问地传达着侵略和进攻的思想。再者，意大利租界的获得被看作是与其他国家的基本倾向一致的；作者把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地利描绘为争夺租界的迟到者，强调他们对其他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可耻的成功例子的模仿，即运用军事联盟和侵略战争手段；这里所使用的中文表达是“极其效尤”。

在描述了租界的起源及其行政管理结构之后，作者提到了一系列重要的中国人，如天津市市长张廷谔、程克和周龙光等<sup>107</sup>，这些人在共和国建立之后就入意大利租界，特别是在 1917—1933 年间，然而即便这些中国官员的级别很高，他们在意大利文资料中也未获得类似的注意。这篇文章继续描写了租界内的赌博、毒品的生产和使用等情况，并把它们说成是意大利租界内的普遍现象。作者还提到了投机买卖的猖獗，这大概是在意大利租界中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家的基本特征，至 30 年代后期已经达到了使租界成为非法交易和牟取暴利的乐园的程度。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探讨了基督教在租界中的影响，并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渗透的信号。

这种重现与最近几年在中文著述中出现的肯定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的态度是与重新包装殖民历史并把它当作天津国际化的开端加以宣传的试图相吻合的。2006 年是“中国意大利年”，天津的旅游图把意大利租界标注成“意式风景

---

105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第 208 页。在描述八国联军入侵时，作者再次提到意大利（203—205 页）。在此书的开始，还有邓小平的题词（此处有误，实为李瑞环的题词一译者）：教育天津人。1926 年天津租界及特区的资料中提供了租界极其详细的资料，包括自然环境、起源和租界管理。参见南开大学政治学会：《天津租界及特区》，1926 年，第 6-7 页。

106 “意租界”，第 134 页。在中国，“意大利”仍然被音译为“意”，但其和今天的汉字“意”内涵和用法上不一样。

107 意租界，第 137—138 页。

区”，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前意大利租界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一带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创建一个带有新“意大利精神”风味商业区的改造工程。在那里，我们吃惊地注意到了破坏和重建的循环：老建筑和新建筑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相当荒谬的效果，其中，实际存在的事物与虚拟的想象，过去和现在，纠缠在一起，变得难以区分。但是其现场仍然背负着殖民和后殖民历史的遗迹，因为这块小地方由以“三民主义”命名的 3 条街道表明了边界；三民主义是由“共和国之父”孙中山在 1924 年创造的：民族（民族主义，意思是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民主（民主主义，意思是西式宪政）<sup>108</sup>和民生（民生主义，政府为人民）<sup>109</sup>。

### 交往区域（Contact Zone）联络地带还是统治地带？

玛丽·路易丝·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对颇有影响的“交往区域”概念作出了如下定义：

“（……）社会空间，在那里，多种文化相互遭遇、碰撞和争斗，通常在高度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背景下进行，如殖民主义、奴隶制度或者它们在今日世界很多地方依然存在的影响。”<sup>110</sup>

普拉特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交往区域”与“共同体”并置，因为她曾建议用这个术语去重新分析共同体模式。以安德森的论证为基础，普拉特对共同体模式本身产生了怀疑，把它理解为一个理想化的虚拟，它趋向于压制别样选择和边缘群体的声音，是一种确认被假定的团体的手段。“交往区域”概念也许对于分析中国学者在本案中借以为自己重现天津意大利租界的写作工具有用。首先，研究证明把意大利的干涉描写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一部分的做法在关于军事干涉事件和随后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的主要历史材料并不占相应的地位。<sup>111</sup>但是告诉我们关于意大利租界想象的共同体事宜的中文资料是什么？租界内部的“交往区域”又是什么？“交往区域”在文学和历史学著作中是一个空白，即人们不能

---

108 在中国，理想的政治生活应该包括两种“权力”：政权和职权。

109 “民生”也可以被翻译为社会主义，尽管蒋介石政府不愿意如此翻译。这个概念可以理解为孙中山划分的衣、食、住、行四个领域的社会福利。对孙中山而言，理想的中国政府有职责为它的人民谋取这些福利。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弗兰克·W. 普里斯翻译，L. T. 陈编辑，上海，中国：中国委员会，和平关系研究所，1927 年（Sun Yat-Sen, *San Min Chu I: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rans. Frank W. Price, ed. L. T. Chen, Shanghai, China: China Committe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27），第 189-192、201-202、210-211、262-263、273、278 页。

110 玛丽·路易丝·普拉特：《交往区域的艺术》，载戴维巴瑟罗迈和安东尼皮特罗克斯基主编《重读的方式》，纽约：白德佛特 / 圣马丁，1999 年，第 5 版（Mary Louise Pratt,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in: David Bartholomae/Anthony Petrotsky (eds.), *Ways of Reading*,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1999, 5th edition) <http://web.nwe.ufl.edu/~stripp/2504/pratt.html> 也参见《帝国的眼睛——游记与跨文化》，罗特莱哲，1992 年（*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Routledge, 1992）。

111 参见《清代档案史料总编》；《义和团档案史料》；廖以中、李德征、张旋如：《义和团运动史》，北京 1981 年，第 180-213 页；《中国近代史》，第二卷，Humana, 1979 年，第 505 页及以后。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二卷，北京 1981 年，第 612-652 页；集体编著：《中国近代简史》，天津 1980 年，第 431-442 页；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北京 1980 年，第 129-206 页。

否认在空间的和社会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个“交往区域”。产生这一缺失的原因在于：只有当两个或更多的来自不同背景以及运用非常不同的处理办法进行讨论的讨论者显示出他们愿意学习如何进行相互交流时，才会出现在被印刷的文化中揭示“交往区域”修辞学的局势。恰如普拉特（Pratt）所言，我们需要“指出如何使交叉点成为其可以成为的最好学习地点。”<sup>112</sup>然而问题是，交往区域并不是一个可靠的空间，它要求我们不仅要挑战我们居于统治地位的观点，还要表达出存在于我们内心的、固有的不同观点。

在中文和意大利文著述中都缺少被普拉特称为“跨文化性”的东西。这个术语源自费尔南多·奥蒂斯（Fernando Ortiz），后来被人类学家用于“描述从属的或处于边缘地位的团体成员对有占主导地位的或宗主国的文化传来的材料进行选择和创新的过程。”<sup>113</sup>普拉特还注意到“原住民本身的自我表达”（autoethnographic），因为“自我表达的文本是这样一种重现，其中被加以如此解释的他者以回应那些文本或与那些文本进行对话的方式进行创造”。<sup>114</sup>没有这两个先决条件，就没有真正的交往区域。因为其出现不仅需要不同组织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作用，而且还需要位于意义形成系统之间的混合和贯通机制。否则的话，重现只不过是自圆其说，由讲话者制造用以引起已由他选择好的听众的注意。这里没有对话，没有可能的其他理解方式进行干涉的条件。人们在选出来的材料中所看到的東西只是对峙：一个绝对的意义形成的异质性，在这里，如果意大利人的叙事被看作是权威的，中国方面的重现就会被排除在外，反之亦然。没有任何质疑双方的可能性，也没有创造新形式的交往和对话的可能性。

意大利文材料的共同特点是，陈述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其风格正如安德森所暗示的那样由3个因素所决定：（一）“有限的”（受其“虽然可伸缩但原本固定的边界”制约）；（二）“至高无上的”和（三）“友爱的”，因为它适合于建立“一种既深切又平等的同志关系”。<sup>115</sup>

在奉献给租界内的中国居民的唯一一段文字中，领事菲莱蒂称他们性格“相当温和”。他似乎相信“中国人对权威原则怀有的莫大尊敬”，因此主张以“公正温和”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他以此就可以对意大利的武装占领作出称赞（和开脱）。他最终以这样的话作出了总结：在占领和改造租界的时候，中国居民从未制造任何“令人不愉快的麻烦”。<sup>116</sup>

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想象共同体开始变成为我所定义的这样“一个想象的统治区”了。统治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它为意大利政府重现了历史报复的三部曲：（一）就意中关系而言，在占领 Sanmun 的尝试失败之后，（二）在由其他卷入“瓜分租界”的外国列强眼中的国际认同方面，（三）对在阿杜瓦（Adua）的军事失败的报复。那么，这真是一个统治区域吗？或者这真是一个交往区域

---

112 普拉特：《交往区域的艺术》。

113 同上。

114 同上。

115 安德森，第15页。

116 菲莱蒂：《意大利租界》，第15页。

吗？有的人会试着根据重现和对城市空间的改造说明统治的真实存在，但也有人会根据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承认它实际上是一个交往区域，对于这个争论，我想从语言学角度加以解决。

## 语言的使用

要对想象的共同体、它的重现和“交往区域”的可能性作出分析，需要对语言的活力有高度的敏感，这种活力在描述自己和他者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杜赞奇认为：“语言之所以会成为历史学的争论点，主要因为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历史的历史性。”<sup>117</sup>

中尉军医本温努迪在写给他母亲长而详细的书信中，展示了他对意大利军事远征的局限性的深刻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批判了为镇压义和团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国际远征军经济利益的导向性、掠夺性和其他残忍的过激行为。他还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它的礼仪、它的民用建筑和宗教建筑表示出某种欣赏。然而，一旦涉及对中国人民的看法，他马上就表现出了典型的意大利种族偏见。他在提到 1901 年进入天津的具体情况时说：“一进到残存的城中，焦糊的味道就被一种堪称中国气味的特殊臭味所取代。它是一种从油脂、泥土等散发出来的臭味，不同于我们在我们自己当中所熟悉的任何一种好的或坏的气味，这就是我们称它为中国气味的的原因。”本温努迪在写给他母亲的书信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中国人的肮脏，特别是在穷人的住房里，但也在富人的住房里，尽管他在下结论时说过：“富人似乎是比较干净的”。

在提到中国妇女时，本温努迪更表现出了种族主义者和厌恶女人者 (misogynist) 的嘴脸：“我没有见过一个不漂亮或不令人愉快但又完全不令人厌恶的中国女人。”<sup>118</sup>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欧洲人租界的出现看作是一种幸事，并且继续对很不尊重妻子的中国男人表现出一种同情，因为“她们看起来极其恐怖”。这种基于其美学标准的低估（即使不是辱骂）充分表现了他所理解的白人种族的优越性，而白人种族的标准则承担着一种述行特征 (a performative character)。中国妇女变成了本温努迪“殖民凝视 (colonial gaze)”<sup>119</sup>的对象，以至于对她们的贬损描述迎合了当时存在于中国家长制社会的行为之间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与此同时，重现发生在妇女和种族间的联系又再次说明了存在

---

117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 235 页。

118 本温努迪，第 28 页。

119 关于“殖民凝视”的理论思考见弗朗兹·法农：《人世间的悲惨》，哈芒斯沃斯：企鹅，1967 年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伦敦：伯拉图出版社，1986 年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London: Pluto Press, 1986)；阿尔伯特·迈米：《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伦敦：索文尼出版社，1974 年 (Albert Memmi, *The Coloniser and the Colonised*, London: Souvenir Press, 1974)；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哈芒斯沃斯：企鹅，1978 年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8)；桑德尔·吉尔曼：《区别与病理学—性、种族和疯狂的陈词滥调》，伊萨克：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5 年 (Sander Gilman, *Difference and Pathology: Stereotypes of Sexuality, Race and Madnes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霍米·巴巴哈：《模仿与人—殖民话语的矛盾心理》，1984 年 10 月 28 日 (Homi Bhabha,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October, 28, (1984)，第 125—133 页。

于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之间的统治关系。这可以作为约翰·D. 凯利 (John D. Kelly) 为补充“理论化了的‘凝视’”而在其著作中提出的有关殖民凝视 (作为权力的一个比喻) 和“控制”政策之间的衔接一个例子:

“凝视可能是欲望衍生物雄性的、淫荡的和有生命力的媒介, 或者是宣称卓越或者全能的媒介, 但在所有方式中, 它穿越了空间, 过于含糊地处理现实权力问题。因此当我们试图谈论权力的时候, 我认为领会 (grasp) 至少和凝视一样值得关注。领会不多也不少地恰恰是内在的物质力量, 它在这一点上与凝视完全一样, 甚至更多地体现在本能上。它同凝视一样, 但以不同的方式, 构成另一种在自身和世界中的实现重写的媒介, 另一种题写、体现和排拒的媒介。”<sup>120</sup>

凝视和领会两者之间的联系贯穿于本温努迪的照片和信件。在一些场合, 在与人直接发生相互作用时, 本温努迪评价了他或他的其他意大利同事治疗过的中国伤病员所表达的感激之情。尽管在这些场合, 他也清楚地把“基督徒顺从” (Christian resignation) 投射到对中国病人的态度上, 表现出对东方病人受伤身体的不满。他看到医生、护士和其他病人的好奇心如何被这些不同肤色的人所吸引, 他把这称为: “新奇事物的展览”。只有在他接触到一位有教养的官员, 特别是因为这位官员流露出“对意大利人的特别同情”以及对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历史 (Risorgimento) 的了解之后, 他描述与中国人交往的语言才变的比较正面。然而,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本温努迪的态度仍仅仅是单方面高度惊讶, 因为这位有教养的中国人“不懂语言, 他之所以知道一些我们的历史, 只是因为他读过中国学者用中文写作的一些中文故事。”本温努迪在这里所说的“不懂语言”大概是指这位中国官员不会说意大利话, 而不是暗示中国语言没有西方语言高贵。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他在谈论中都对通过阅读中文材料了解关于意大利知识的可能性表现出一种莫名的惊讶, 就好像殖民地的人没有资格通过他们自己的资料, 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写作一样。

当本温努迪描述到中国的建筑和民用工程时, 他承认有向他们学习的可能性: “如果我待在中国的时间能长一点, 我会对它更加热心。中国人被称为野蛮人, 因为他们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比较方便了。然而, 在许多事情上他们都可能成为我们的老师”, 因为在许多方面他们都“超过了我们。”<sup>121</sup>

再重复一遍, 帝国主义和东方主义似乎将手拉手地进行下去, 因为本温努迪信件的真正价值在于自我反省: 它提供了与其他同类著述相比更多的关于意大利军队的无节制和不道德行为的资料, 同时也提供了他自己对他者的感知的资料, 这比其它任何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的真实信息都好, 日常生活的信息似乎是属于不同的领域, 它隐藏在不断的变化中。

---

120 约翰·D. 凯利: 《凝视与控制—种植园、欲望、订立契约的印地安人和斐济的殖民法律》, 载莱罗拉·曼德森和马格雷特·乔里主编: 《欲望据点、休闲经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性生活》,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7年 (John D. Kelly, *Gaze and Grasp: Plantations, Desires, Indentured Indians, and Colonial Law in Fiji*, in: Lenore Manderson & Margaret Jolly (eds), *Sites of Desire, Economies of Pleasure: Sexualit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7), 第92页。

121 本温努迪, 第44页。

像本温努迪这样的见证人的重要性在于他提供了对意大利使命的成功（意大利媒体的描述）的神秘化信息，揭示出制造虚幻的成功工具化操纵。实际上，意大利参与国际远征军应该被看作是对阿杜瓦（Adwa）战役失败的历史性复仇。

## 结论

1947年2月10日签订的《巴黎条约》剥夺了意大利的殖民地，当然也包括天津租界。<sup>122</sup>然而在天津事件中，这个最终行动仅仅是个形式而已，因为在4年前，也就是在1943年初，意大利已经与其盟友日本达成协议，放弃对中国居民行使任何权力，并把此项职责转交给南京国民政府。

研究非洲殖民主义的学者已经分析和强调了为什么意大利统治阶级“拒绝对殖民主义现象开展系统的、有组织的、广泛的和扎实的讨论”<sup>123</sup>的原因，这篇论述意大利在亚洲唯一的殖民主义事例的文章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这一学术争论有所贡献。这种尝试要求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以便澄清其虚构的和多维度的特点。我工作的主要范围严格地说仅在于谈一谈方法论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有关意大利租界这个微观世界的殖民和后殖民形式的“知识”？我们可以从研究这个对于其他殖民重现和实践同样有效的“实际存在”中学到什么？我的意图是揭开试图肯定殖民主体的主权的种种思想观念，它们或者是有意识地执行或者是无意识的执行，或者是明确的感知或者是暗含的感知。我试图解构叙事的机制，这种机制促成了对意大利在天津进行干涉表示完全拥护的欣赏，也促成了对先前状态采取完全否定态度的贬抑。

非洲历史学家阿希尔·姆班贝（Achille Mbembe）<sup>124</sup>曾经令人动情地提出了一种更加透明的方式对殖民经历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并且最近启动了一个在我看来对研究意大利人在中国（以及在其他地方）的经历也非常有用的研究项目。姆班贝研究了非洲后殖民国家试图把它们自己从欧洲统治的符号中解放出来，并设想用其他方式来组织公共生活的做法。他们对自己国家的重新命名过程暗示了一个对先前被征用地区和首都进行符号改造的重新占用：通过使这些城市重新基督教化，不少国家已经表达了他们重新建造城市景观的愿望。

“殖民化的回忆并不经常是甜蜜的。但是与植根于非洲受害者的意识传统相反，殖民时代并不仅仅是破坏，殖民化本身也并不仅仅是可恨的系统。它到处都被逃跑线（escape lines）所穿越。殖民政权把它所有的精力放在试图控制逃跑者和利用它的自我管理作为基本的，甚至是

---

122 第5部分，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第24、25、26款（Section 5, Special Interests in China, articles 24, 25, 26）。

123 帕特里西亚·帕路姆博主编《太阳下的地盘—统一后至今意大利殖民文化中的非洲》，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第8页（Patrizia Palumbo (ed.), *A Place in the Sun: Africa in Italian Colonial Culture from Post-Unification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8）。

124 杜阿拉通讯，喀麦隆，2006年3月29日（Le Messager di Douala, in Camerun, 29/03/2006），参见网上文章：《一个埋葬殖民主义的象征》（Pour une sepulture symbolique au colonialisme）载 [http://www.africultures.com/index.asp?menu=revue\\_affiche\\_article&no=4365&section=rebonds](http://www.africultures.com/index.asp?menu=revue_affiche_article&no=4365&section=rebonds)，资料获取时间2006年5月2日。

决定性的维度。不了解这些被假定为冲突的逃跑形式本身的情况，就不可能了解殖民体系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它又是怎么自我解体的。”<sup>125</sup>

基于这样的认识，姆班贝提出了下列主张：

“我希望所有的非洲国家能很快对雕像和殖民纪念碑进行详细的搜集。它们应该被集中在一个单独的公园，不仅作为下一代的博物馆而且作为在这块大陆上埋葬殖民主义的象征。在完成这个仪式之后，我们就不能再以殖民化作为我们当代人耻辱的借口了。自从我们开始讨论此事以来，我们已经决定永远不再为任何人树立雕像了。与之相反，我们要建立图书馆、剧院和文化场所，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够为未来的文化培养提供创造力。”<sup>126</sup>

从后殖民和后殖民的城市景观的重组来看，首先，天津的租界区可为开始和更进一步地实现姆班贝倡导的文化工程提供一个清晰可辨的坚实基础。这种可能性，作为对这个区域采取大规模市场经济化措施另一种选择，是在我的结论里愿意提出的第一个尝试性建议。

其次，本文同时也被考虑为这样一种尝试，即在各种著述之间营造一场假想的对话，希望能在西方的和中国的历史学家之间开创新的对话途径。揭开重现不同层面的过程导致了对意大利租界进行辩证讨论的思想的出现：实际上出现的并不是对意大利单方面认同性虚幻的客观重建，而是更像两个（或更多的）经常引起对抗和争论的可能的故事。这些故事之间的辩证法具有对抗的意味，甚至是对分析的颠覆，目的在于破坏同一和均衡的趋向；这些趋向假装看不见他者，而不是接受他者为在我们自己当中固有的存在。

我从我的研究中得出的第三个结论是，意大利著述中的租界影像揭示了一种历史报应类型，不仅仅是针对当时意中关系既晚又不成功的开始，更是针对当时侵入中国的其他殖民国家。对意大利租界地区的转型（伴随着中国原有村庄的消失和超级意大利认同的附加）的单方面极端肯定的重现可以在作为一个具有与其他列强同等尊严的统一和现代国家的意大利长期追求重新获得威信和正统性的概念框架中得到解释，因为殖民管理机构在 19 世纪末是获得被承认为“现代国家”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从意大利文著述中，人们可以看到，占有租界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而是在于它像镜子一样具有证明价值，这就是证明意大利有能力宣称自己是一个殖民国家。

与此同时，并且以某种方式从主观上超越这种国家认同层面，分析过的资料显示出了一种把意大利殖民主义描绘为良性殖民主义的努力，好像意大利在天津的活动主要是一个恩人自发援助和帮助当地社区的行为。这种欺骗性的叙事在法西斯时代达到了高峰，当时的意大利文著述提供了神话般的声称意大利人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的言论，说有一个深受尊重的中国文人（但没有指出姓名）曾经指

---

125 同上。

126 同上。

出：“哦！我们的同胞曾经对马可波罗寄予莫大信任。”<sup>127</sup>这一相当暧昧的声明表达了对意大利“迟迟未能”干涉中国事务的懊恼。

把意大利看作一个恩人的观念在肯定“意大利精神”的意向中引起了共鸣，它被包装和输出到租界这个想象的微型共同体中，以便在国际国内为新建立的统一的意大利争取到合法的集体认同。随着墨索里尼政权的出现，人们又看到了颂扬意大利精神的所谓优越性的做法。意大利租界因此被以典型的东方主义者的自我反省的方式加以描绘，但很快又被法西斯宣传所改变。这种比喻（parable）显示了反射映象的矛盾性，它在远离国内问题的情况下得到了快速增长。

“（这个）小地方是我们在遥远东方的眼睛；在这里，不仅汇聚了所有意大利人的注意力，还汇聚了那些珍视祖国荣誉的人们的感激之情。不管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组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天津租界依然故我。就像墨索里尼所说的那样，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意大利文明的前哨。”<sup>128</sup>

(孙立新、刘宁译)

#### 作者简介：

**马利楚** (Maurizio Marinelli)，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高级讲师。

#### Contact:

Maurizio Marinelli  
Senior Lecturer in East Asian Studies  
Centr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istol  
8 Woodland Road, Bristol BS8 1TN, UK  
[Maurizio.Marinelli@bristol.ac.uk](mailto:Maurizio.Marinelli@bristol.ac.uk)  
+44 (0) 117 3317105  
+44 (0) 117 954 6604

#### 译者简介：

**孙立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宁**，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历史地理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

127 参见 M. 卡塔兰诺：《我们的意大利天津租界》，载《意大利与世界》，1936年5月，见凯撒·凯撒利：《天津的意大利租界》，罗马：法西斯殖民研究所，1937年（Catalano, La nostra concessione di Tien Tsin, in: *Le Vie d'Italia e del Mondo*, May 1936, reported in Cesare Cesari, *La Concessione Italiana di Tien-Tsin*, Roma: Istituto Coloniale Fascista, 1937），第23页。

128 C. 凯撒利：《天津的意大利租界》，第23页。

